文化事业的经费。日本则指定将其所退部分款由双方合组东方文化事业总会，设于北京，在北京建一人文科学研究所，续修《四库提要》，盖了一个藏书楼，藏书十六万册。当时续修《四库》，经费充足，一篇提要付酬金三十元，能购面粉十五袋。每篇提要写成，均打印若干份，除给作者外，还送到日本去。本所图书室现存有当时的打印稿。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发生，日军杀害中国外交特派员，于是中方委员长柯劭忞率众退出。而日方则另外找人续修《四库提要》，到四十年代初期。其全稿闻台湾已编印成书。

后人读《四库提要》，曾有辨正之作。许瀚曾写过好几篇这类文字，叶廷琯的《吹网录》中亦有涉及。余嘉锡一生读书，以《四库提要》为指南，有许多不同意见，写出五百余篇文字，成《四库提要辨证》一书。胡玉缙著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内容甚夥，有二千二百余篇。余氏书为一生读书之心得，已成一家之言，胡氏书则为辑录清人论述，可供读四库总目者参考。

（这是作者的一份讲课记录稿，由陈祖武同志记录，
发表时，作者又作了一些修改和整理）

清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王　锺　翰

目前国内清史研究工作的形势一片大好，清史研究的专门机构林立，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史研究室和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等等，其他各高等院校历史系开设有清史课的，尚未计算在内；而且还出版有清史研究的专门刊物，如《清史论丛》(已出三期)、《历史档案》(已出七期)、《清史译文》(已出八期)、《清史研究集》(已出二期)、《清史研究通讯》(已出二期）等，至于许多杂志期刊内大量刊登清史专题论著的，更多不胜举。比起解放以前，人才辈出，成就卓著，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即使如此，解放三十多年来，史学工作者对清朝历史的了解、研究和探讨还很不够，至今也没有一两部多卷本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思想，能写出过几百万字、贯串一代三百年间之事，而又比较全面、系统、详明的《清史》来。

过去，在二十年代，曾由一大批遗老遗少开始纂修，历时十五、六年，最后刊印出七、八百万字的《清史稿》，不但立场观点反动，而且体例杂乱无章，内容舛误百出，当时就有人建议重修或进行一次大修改，但迄未见诸实行。重修清史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势必落在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的肩上。《清史稿》之不满人意，是既成事实，但及今重修清史，兹事体大，谈何容易？然而清史之有待重修或改写，亦系我们无法推诿之责，将如何而后切实可行，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窃以为在正式调动全国人力，集中全国资料，开始动笔撰写以前，应尽先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这里仅就清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谈一点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提供大家参考。

一、与近代史的关系

谁都知道，清史是从一六四四年清朝入关定都北京算起，直到一九一一年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推翻为止，前后经历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我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把清朝历史以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作为一条界线分割成两半：一八四〇年以前为一半，属于中国古代史范畴；一八四〇年以后为另一半，属于中国近代史范畴。这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际的，当然是科学的历史分期法。但是讲或写清史的人一般总断限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史范围之内，从明末万历年间满族的兴起讲或写到清中叶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以前为止，不但把鸦片战争以后的道、咸、同、光诸朝近七十年的历史划入近代史范围之内可以不讲不写了，就是本来属于古代史范围内的乾、嘉二朝近九十年的史实也很少提及，就提及也语焉不详。这样一来，岂不是好好的一部完整的清史被折腾成有头无尾，残缺不全了吗？

我同意李侃同志的意见，清史不能代替近代史，同样的，近代史也不能代替清史。"因为清史和近代史各自研究的主要对象不同，重点不同，所以两者之间，不是互相代替，而是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清史作为一部封建王朝的断代史，不能只写前期，不写后期"（《对研究清史的一点意见》，载《清史研究集》第一辑/页17—18）。如果把清史讲明白了或写清楚了，只能对近代史的了解和研究更有好处、更有帮助。举例来说，整个清朝一代的政治制度、行政区划和意识形态各方面，大都沿袭前代而又不同于前代，其沿革损益是有所创新、有所补充的。如果对它没有一个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就是对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中的许多典章制度、人物掌故，也是无法获得正确认识的。

至于某些欧美资产阶级学者把清史划入近代史范围，自然是"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可是苏联的一些学者把整个清朝一代的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来看待和处理，乃是别有用心，不尊重我国历史的具体实际，属于反对中国革命的另一类性质的问题，这儿就不予讨论了。

二、与满族史的关系

清史与近代史的关系既如上述，那么，清史与满族史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顾名思义，清史是研究整个清王朝三百年间的历史，满族史则是研究满族这个民族的历史。问题是，讲或写清史离不开要讲或写到作为清王朝占统治地位的满族统治阶级及其被统治的满族人民，反之，讲或写满族史不但要讲或写到满族统治者和被统治的满族人民，更要提到他们分别在整个清王朝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分别在这段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两者的历史时间既然如此相同，互相关联又如此深厚，也就很难硬把两者割裂开。过去研究清史的人，很少不从事清朝入关以前的历史的研究，特别对明代东北地区女真人的兴起、活动及其与中原的经济、政治联系必须加以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的。不从清朝入关以前女真人的研究开始，对清朝前期和后期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是无法理解和搞清楚的。从事这些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可以肯定地说，它应该是属于满族史的研究范围之内的事；可是谁又能说象"清朝开国史"，如《皇清开国方略》一书，不属于清史范围之内的呢！

这样一来，是不是说清史和满族史没有任何区别了呢？当然不是的。清史和满族史各自有不同研究的主要对象，侧重面也不一样，因此，两者之间不是可以互相代替，而是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两者的区别在于，满族史只是满族一个民族的活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清史则是整个封建王朝的兴亡史。满族史的侧重点在于讲或写满族这一个民族的人民的历史，当然并不排斥也要讲或写它与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关系史；清史既是讲或写整个清王朝的历史，除了讲或写满族这个民族以外，更要讲或写其他众多兄弟民族的历史。讲或写清史，不能抛开满族不讲不写；同样，讲或写满族史，当然也要把它摆在清史之中来讲或写。这个道理是最浅显不过的。谁都承认，有时讲或写清史，把有关满族方面的东西讲或写得多了一些，相反，讲或写满族史又把有关清史方面的东西讲或写得多了一些，都是有的。只要各自的重点突出，两者的主体方面没有混淆，则此少彼多，惟在叙事所需而定。

由此可见，清史和满族史是既有区别而又有关联；如果一定硬要把两者分割开，使之各不相谋，是行不通的；同样，一定硬要把两者等同起来，不加区别地合二为一，也是不恰当的。两者之间理应做到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各自的侧重点十分突出，互相联系，互相补充，能使清史和满族史的研究和探讨有显著的进展和提高，并有更好更多的成果大量出现。无疑是大家所喜闻乐见的。

三、档案资料的整理

从事清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必须首先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指导思想，对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认真的、细致的和深入的分析，经过排比、推论和概括等一系列的工作，才能做出接近历史实际、符合科学方法的结论。如果离开丰富的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材料，轻易地作出的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由于清王朝是我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距今时间最近，保存到现在的档案资料数量最多。据报导，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即多达九百数十万件。该馆近年来出版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已出七期)，才发表的档案不到一千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刊印的《清史资料》(已出三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出版的《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和《天地会》资料（已出二册）以及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史研究室出版的《清初史料丛书》(已出十一二种）等等。成绩斐然，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然而如果按照现在出版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这个速度来计算，等到把全部档案发表出来，不是数十百年可能完成的事，恐怕要等上千上万年才能刊布完毕。而其他文献实物资料究竟有多少，都未估计在内。

现在的问题在于，首先应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第一历史档案馆三个清史专门研究机构发起，组织全国人力，通盘计划，分门别类，挑选出重大的历史事件，或以时为主，或以事为主，或以人为主，或以地为主，尽量把一切档案资料集中起来。集中多少就发表多少，不必求全责备，也不一定按时间先后编排，要从搜集到或翻译出的档案资料实际出发，尽快地按专题发表出来，让清史研究工作者能尽先地利用，便于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其次，如果档案资料能分类编排发表，除按目前出版的《清史资料》或《丛编》的形式外，是否也可以考虑，依照二三十年代曾出版过的《文献丛编》或《史料旬刊》的形式，将

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每一件档案资料，页数起止相连，可以作为活叶形式分别刊登在《资料》或《丛编》上，等到这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档案资料告一段落，刊登完毕，史学工作者就可以按照专题档案资料集合起来分别装订成册，更便于对某一专题的参考和研究。特别是字数比较多的档案资料或翻译较长的第一手资料，一时出专书时间要很长，如果采取这类形式分期分批发表出来，将使清史研究工作者深感利便。

四、专题研究的论著

正如戴逸同志指出的，清史资料有三个特点：多、乱、散（《谈清代书籍和史料的整理》载1982年2月15日《光明日报》）。但研究清史上的任何一个历史问题，为了掌握它的全面情况，首先必须广泛地从多、乱、散的清史资料中搜集各方面有用的史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认真地批判和分析，鉴定它的真伪，或文字有无讹误等等，然后才能利用这些史料去分析历史事物的性质、内容、形式以及各种相互关系和它的发展变化。如果整个清朝历史的专题研究的论著多起来了，更加深入下去了，一个一个的清史问题有了比较满意的答案和解决，即使对有些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也无妨，因为学术上“百家争鸣”的不同意见，是完全允许的，对问题的进一步深入钻研只会有百利而无一害。

当然不能由于加强对专题研究论著的重视，可以得出不要简明的清代通史写作的结论来。正是由于今后要加强重视和提高清代通史的编写质量，更要努力多做快做一些清史专题研究的论著。通史和专题研究的关系是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只有在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很好的普及；反之，也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更好的提高。两者之间不是互相代替、互相取消，而是互相关联、互相补充。专题研究的论著越多、质量越高，通史体裁的专书质量也就越高；反过来，通史的书越多，质量越高，要求专题研究的问题越多，对专题研究质量的要求也就越高。随着岁月的推移，通史和专题研究的成果也将与日俱增，益趋完美。

谁也不能希望，一人用毕生的精力就能将所有的清史专题解决好了，或能将一部简明通俗的清史写得尽善尽美、一无欠缺了，正确的态度是，清史研究工作者必须立志从事细致、深入的钻研，能尽量快、尽量多地解决一些专题，即使只能解决一两个专题，并能提出一些前人所未提出的新见解，都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当然在此时此刻，在可能掌握史料的范围内，认为问题是算解决了，可是过若干年后，又有新史料的发现，好象业已解决了的问题到头来又必须重新再写，这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也正是历史科学向前进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清初学者谈迁孺木曾借钞明十三朝实录，成《国榷》一书，后书被窃，复钞补成之。较晚于谈孺木的，又有万斯同季野，他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能背诵明列朝实录。清乾隆初刊定的《明史》，号称精心结构，实出万季野一人之手。清中叶蒋良骐钞清五朝实录，成蒋氏《东华录》，清末王先谦钞十朝实录，成《东华续录》，朱寿朋又据邸抄成《光绪朝东华录》。终清一代，能熟读清十二朝实录，求如谈孺木、万季野之能熟读明列朝实录者，恐迄今尚无其人。这是由于光绪朝实录完成于民国十五六年间，非清人不能读，实因时间限制不及读也。可是自二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的五六十年间，清十二朝实录早已刊布，公之于世，实录卷册数量虽多于明，而借阅条件的便利似远胜于明末清初之际，而从头至尾地能将其熟读一遍者，果有谈孺木、万季野其人否？

解放前有孟森心史先生抄《朝鲜李朝实录》成《明元清系通纪》，作为讲义，印成十六

册；几乎与孟先生同时开始，是吴晗同志也通观《李朝实录》，抄成《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凡十二册，前一两年才由中华书局公开出版。两先生皆已作古，而读书之多，抄书之勤，犹然典型宛在，长留后学景行之敬。

尤所跂望者，我们即应效法前哲通读实录，抄录实录之成规，孟、吴二先生既抄《李朝实录》于前，我们也应学习谈、万二公通读明列朝实录之法，最低限度能将清列朝实录通读一遍，将其中有关历史事物的记载分类抄录出来，按年、月、日排列，作为进一步研究清史的参考资料。今兹提出，愿与同志们共勉之。

为清史研究进一言

来 新 夏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它是中华民族的融合者；它也是封建文化的总括者……。但是，过去由于辛亥革命时期强调反满宣传的某些影响，使清史研究的进展较为缓慢。近年来，情况大有改观。去年九月举行的全国第一次清史学术讨论会就是一种明证。从大会收到的近七十篇论文看来涉及到阶级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有不少成果。不过，若能以此为起点，延伸开拓，定将使这一重要史学领域出现更为绚丽多姿的风采。我躬逢盛会，受益良多，也愿借此略贡管见，期备采择：

(一)研究新课题：这次会议论文的课题范围比较广泛；但从编写一部清代全史来说，原有课题可作新的伸展，而未涉及的课题也亟待开拓。即如阶级结构问题，近年来的文章论述农民、地主、雇工和游民较多；但对商人论述就较少。康雍乾时期的商人，我看主要有垄断商人（盐商、铜商、行商）、大商人（米商、木商、布商、批发商等）、一般铺户商人和小商小贩等四种类型，对他们的基本面貌就缺乏较完整的描述。这时商人地位有所提高，但如何提高没有足够的说明，是否可从官僚（高士奇、王鸿绪）士人（钮匪石）的经商，商人的作官（汪启淑），社会上的意识观念中对商人的拜倒（拜门求助、联姻结纳、交往礼遇）等方面作些探讨？又如对城市居民中各色人等（如医生、塾师、卖字人、办婚丧事者、家庭手工业者、厨师、埠夫、装水烟人）的剖析。对于游民的研究多注意穿州过县和老林棚民；但游民的其他出路则未多顾及，如说唱艺人、跑马卖解者、乞丐、迷信职业者、长随跟班、地棍流氓（这类人遍及全国，各地有专称，福建称“聊落”，江南称“泼皮”、江西称“棍子”、广东称“泥腿”，他们对社会起破坏作用）。在政治方面研究事件典制者多，其中有需要更多探讨者，如中央集权究竟是强化统治呢？还是表明统治力量在削弱？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除康熙与鳌拜问题、雍正夺位问题涉及较多外，其他乾隆朝党争、道光朝政争、咸同间的“祺祥政变”，光绪朝的帝后之争以及满汉官僚之争、督抚同城之争等等都值得进一步考察。在文化方面，这次会议讨论了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但有些问题还可深究，如乾嘉学派的校勘、考证、版本、金石、训诂、音韵诸学是否有阶级属性，还是一种纯技能。辑佚学的恢复古书面貌是否与乾隆的禁毁古籍在客观上起到抵制与反抗的作用等等。

(二)发掘新史源：研究历史需要史料已是常识问题。正经正史等基本史料应该首先掌握